

ZHONGGUOXIANDAIZHUYI
WENXUESHILUN

李林展◎著

中国现代主义 文学史论

中



中国书籍出版社

ZHONGGUOXIANDAIZHUYI
WENXUESHILUN

李林展◎著

中国现代主义 文学史论

中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论/李林展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3. 6

ISBN 978 - 7 - 5068 - 1126 - 2

I. 中… II. 李 III. 现代主义—文学史—中国—20 世纪
IV. I20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4589 号

责任编辑 / 张 瑞 武 斌

责任印制 / 王大军 武雅彬

封面设计 / 汇智泉文化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2 (总编室)

(010) 52257154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 sina. 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69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 31

字 数 / 360 千字

出版日期 / 2010 年 2 月第 2 版 2010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 92.80 元 (上中下)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二编 50-60 年代台湾、香港现代主义文学

第一章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及其特征 (3)

第二章 现代诗社及其代表诗人 (20)

第一节 现代诗社 (20)

第二节 纪弦的诗歌 (22)

第三节 郑愁予、羊令野的诗歌 (29)

第四节 林泠、方思的诗歌 (36)

第三章 蓝星诗社及其代表诗人 (43)

第一节 蓝星诗社 (43)

第二节 余光中的诗歌 (46)

第三节 覃子豪、罗门的诗歌 (52)

第四节 蓉子、夔虹的诗歌 (59)

第四章 创世纪诗社及其代表诗人 (67)

第一节 创世纪诗社 (67)

第二节	洛夫的诗歌·····	(70)
第三节	痖弦、张默的诗歌·····	(77)
第四节	叶维廉、商禽的诗歌·····	(86)
第五章	现代主义小说及其代表作家·····	(94)
第一节	现代主义小说概说·····	(94)
第二节	白先勇的小说·····	(98)
第三节	聂华苓、於梨华的小说·····	(106)
第四节	陈若曦、欧阳子的小说·····	(113)
第五节	王文兴、七等生的小说·····	(120)
第六章	香港现代主义文学·····	(129)
第一节	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与发展·····	(129)
第二节	刘以鬯的小说·····	(139)
第三节	西西、也斯的小说·····	(143)
第四节	蔡炎培、戴天、温健骝的诗歌·····	(147)

第二编

50—60 年代

台湾、香港现代主义文学

第一章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 崛起及其特征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这颗文坛行星，在运行到新中国诞生之际，便脱离原有轨迹，隐匿到宇宙星空，给自己留下了近 30 年的空白领域。历史总有些令人惊喜的巧构。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作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同游子，以旅途人的心境，于 50 年代萌芽，于 60 年代兴旺，于 70 年代衰微，恰似星星点灯，照亮台湾文坛近 20 年。它的产生和发展，正好镶嵌在大陆近 30 年的那个历史空白上，虽然不十分熨帖，却使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这根链条虽衔接得不够润滑而嘎吱作响，但毕竟周行运转起来。

首先，探明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崛起的原因，将有助于我们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乃至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整体把握。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盛行一时，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当时台湾特定政治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必然产物。它的兴起，有其社会的和文学的种种原因。

台湾资本主义全景式的对外开放，为现代主义的繁衍创造了滋生的温床。50 年代开始，台湾当局为了生存和发展，实行资本主义全方位的对外经济开放。靠美援为生（其次是日援），由初期“美

援”的涌入，到60年代中后期外资的输入，台湾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急剧变化，由原来保守、落后、封建型的农业社会逐渐转向开放、富裕型的资本主义工商社会。随着对外经济开放，西方各种文化、文学思潮，也就不可避免地一齐进入台湾市场。因而，台湾社会西化倾向严重，形成了经济起飞、精神颓废的社会态势。特别是台湾城市生活领域，生活方式西化，不少人染上了“精神崩溃”这种只有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畸形发展中才会有的“现代病”。此种情况的产生，无形中就为西方现代主义在台湾扎根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诸如存在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泛性主义，以及其他各种现代主义文艺思潮，随着金钱和商品的流入而纷纷涌进台湾。它们成了台湾苦闷、彷徨的一代知识青年抗拒现实、冲决罗网、实现自我解放的思想武器。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也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母体文化的断乳期，致使青年一代作家转向西方寻求文学出路。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不断叫嚷“反攻大陆”。从1950年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开始，国民党一直把“反攻复国”的梦想寄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上。为此，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人民加紧实行严厉的政治控制和思想钳制。在文学方面，禁止阅读大陆书籍，查禁“五四”和“30年代”的革命文艺，切断台湾文学与大陆母体文化的联系，强制推行官方的“反共文学”。文化领域的白色恐怖，自然使台湾读者长期孤立于中国现代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之外，很多青年对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传统是陌生的。台湾文学与祖国文化的隔绝，势必导致“年轻的作家是全无‘五四’以来新文化新文学传统的持续意识和历史透视的”^[1]。他们不得不背离传统，转向西方去寻求文学出路，尤其是去“无原则地承袭欧美文学的末流”^[2]，并使

之成为他们最主要的精神食粮。

失落感和对生活的迷惘，迫使作家走向自我，藉以探寻自我生存的深层领域。50、60年代的台湾社会，在中青年一代心理上滋长了一种迷惘、失落、疑惧的情绪和逃避政治现实的倾向。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当局依靠“反共复国”的政治神话实行其统治，制造严酷的政治气氛，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畸形物质文明，文化堕落和社会犯罪现象在台湾迅速泛滥，如此突出的病态社会，在文学青年当中造成了空前的精神危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当时台湾有一部分从军队中来的大陆籍的文学青年，眼看归期无望，普遍产生了一种失落于孤岛的颓丧情绪；而一部分学院派的青年对台湾社会及其专制统治抱有不同程度的不满和恐惧情绪。但是，他们不敢表露心迹、揭露现实，只好转向内心世界的表现。诚如海外华人评论家刘绍铭所说：“由于缺乏有意义的主义的服膺，由于无法矫正的时弊，改革政治，台湾作家只得走向‘自我（self）’，借此对他们的存在作更深的探讨。”^[3]这一心绪的普遍存在，就为以探索内心为特征的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环境。

反共文学的泛滥，促使作家走上追求“纯艺术”的道路。50年代初兴起的反共文学在台湾猖獗了四、五年，笼罩着1956年以前的台湾文坛。许多人深受其影响。但到了60年代，曾受“反共文学”影响和欺骗的不少较严肃的青年作家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的“反攻大陆”已注定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当代“神话”，并对服务于其“神话”的反共八股所表现出来的脱离台湾现实和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创作倾向深感厌恶和失望。于是，这种对反共文学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反叛，促使青年作家开始了对人性和人生意义的探求，突出自我的主观世界，苦心孤诣地去创造非政治化、非社

会性的所谓“纯文学”。台湾评论家何欣曾对当时的情况作过这样的描述：“在这十年间（指1949—1959年间，引者注），文学作品大部分都是反共抗俄的、战斗的主题，小部分仍迷醉于所谓贩卖春情、‘贩卖案头清供、贩卖古董、贩卖传奇、贩卖鬼话’中；而另一部分较严肃的作家对前述两者均感相当失望，他们觉得文艺作品流于声音宏亮、内容空洞的八股或消闲玩意均非正途，于是开始探索另一条偏重于艺术的路。”^[4]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现代派在台湾的产生，首先是以现代主义诗歌的崛起为标志，而现代派在台湾诗坛的兴起，又是以纪弦为首创办的《现代诗》诗刊作为标识。纪弦曾是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中的一员。他写作现代诗，并和戴望舒、徐迟一起创办过“现代诗派”杂志《新诗》月刊。其后，“现代诗派”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解体，纪弦则一直秉承“现代诗派”的诗歌观念和创作倾向。他到台湾后，将大陆诗坛现代派的精神带到了台湾。50年代初，正是他第一个擎起现代派的旗帜，成为台湾倡导现代主义诗歌的主将，使30年代“现代诗派”的余绪在台湾找到了复活的契机。当然，现代派在台湾的产生，个人的提倡只起触媒作用。但是，其倡导的成功不仅在于暗合了现代派得以生存的某种趋势，更重要的是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主义文学的香火于50、60年代在台湾得以延续开来，证明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与大陆3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有着某种历史的渊源关系。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现代主义文学就在台湾文坛产生并发展起来，占住了60年代台湾文学舞台的主角地位。我们认为，台湾现代派的崛起是一股历史潮流，是不可能断其流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台湾当时的历史趋向和文学趋势决定的。它的崛

起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如前所述，开台湾现代派文学风气之先的是现代派诗歌。纪弦于1953年2月创办《现代诗》季刊，“现代派”这一名称在台湾由此而确立，并于1956年1月成立了“现代诗社”。1954年4月，覃子豪发起的“蓝星诗社”成立；同年10月，张默等人组织的“创世纪诗社”诞生。从此，三大诗社在台湾诗坛鼎足而立。1956年9月，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了，它的问世，标志着台湾现代主义小说进入倡导、滥觞的时期。其后，白先勇等人发起的《现代文学》创刊，成为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主要阵地。至此，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就由现代派诗歌和现代派小说这两支横吹“西曲”的队伍组成，于50、60年代在台湾文坛并驾齐驱，各领风骚。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形成于50年代，到60年代成为台湾文学的主潮，70年代渐趋衰微，它经历了萌芽、兴旺、衰败的过程。它的兴衰演变烙下一条“反叛传统——走向西方——回归东方”的弯弯曲曲的深深印痕。它为什么会由盛而衰？人们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探讨。这里，考察其连续不断的“现代诗论争”，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具研究价值和认识意义的。

“现代诗”的论战，既有与其他派别的，也有现代派内部的。其论争的内容比较广泛，但后来逐渐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如何对待民族传统和如何对待读者的问题。论战是从批评纪弦为“现代诗社”制定的“六大信条”开始的。六大信条中，第二条和第四条是引起论争的最为核心的内容。具体内容为：

②我们认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这是一个总的看法，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无论是理论的建立或创作的实践。

④知性之强调。

几次主要的论战简介如下。

1957年，覃子豪在《蓝星诗选》“狮子星座”号中，发表《新诗向何处去？》一文，针对纪弦的“六大信条”，提出了发展中国新诗的“六条正确原则”：

①诗并非纯技巧的表现，艺术的表现实在离不开人生。

②诗应该顾及读者，否则便没有价值。

③所谓诗的实质也就是它的内容，是诗人从生活经验中对人生的体验和发现。

④诗要有哲学思想为背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诗的主题比玩弄技巧更重要。

⑤树立标准，从准确中求新的表现。

⑥自我创造是民族的气质、性格、精神等等在作品中无形的表露，新诗要先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不能盲目地移植西方的东西。

这是覃子豪几十年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五四以来新诗经验的最基本的概括。他批评了纪弦的“横的移植”与诗的抒情本质相对立的“知性之强调”等理论主张，主张建立民族型、传统型的现代诗。对此，纪弦发表了《从现代主义到新现代主义》和《对于所谓六条原则之批判》两篇文章，为自己的“六大信条”辩解。覃子豪又发表《关于新现代主义》一文，进一步批驳了纪弦的观点。事实证明，尽管纪弦在被批评后，对自己的主张作了重新修改和调整，

但“六大信条”对新诗的发展造成了恶劣影响。覃子豪的六条原则是正确的，对台湾新诗后来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深远的影响。

1959年7月，女作家苏雪林在《自由青年》第22卷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新诗坛象征派创始者李金发》的文章，批评现代派把新诗弄得“随笔乱写，拖沓杂乱，无法念得上口”，并说：“大陆沦陷，这个象征的幽灵又渡海飞来台湾，传了无数徒子徒孙，仍然大行其道”，以至使台湾的现代诗“晦涩暧昧到了黑漆一团的地步”。苏雪林的批评被认为是“保守批评家”对现代派的攻击，立即遭到覃子豪的反驳，他在《论象征派与中国新诗》一文中，肯定了“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优良传统，说明了台湾现代派是“接受了无数新影响而兼容并蓄的综合性的创造”，同时也指出台湾现代派的诗“由于盲目摹拟西洋现代诗，其结果常以暧昧为含蓄，生涩为新鲜，暗晦为深刻，成为了伪诗”。之后，苏雪林发表《为象征诗体的争论答覃子豪先生》，覃子豪又发表《简论马拉美、徐志摩、李金发及其他——再致苏雪林先生》。在论争中，苏雪林的观点得到许多读者的支持。人们呼吁诗人们走出象牙之塔，走到群众中间来。

1959年11月20日至23日，《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了邱言曦的《新诗闲话》，后又登出其《新诗余谈》，接着又发表了寒爵的《四谈现代诗》。他们对现代派诗的激烈批评和全面否定，轰动整个台湾文坛，招致现代派诗人们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全面反攻。一些重要刊物，如《现代诗》、《创世纪》、《文学杂志》、《现代文学》、《笔汇》、《剧场》、《文星》等，都卷入了这次批判和反批判的活动；覃子豪、余光中、钟鼎文、洛夫、羊令野、黄用、白萩等各路大将都纷纷挥笔出场，捍卫现代派。这次论争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如何对待民族传统和大众化这两个问题上。论战持续时间较长，直到1960夏

才结束。

1971年，现代派内部爆发了余、洛论战。余光中于1961年在《现代文学》第8期上发表了其诗作中最长的一首诗《天狼星》。十年后，洛夫发表长篇评论文章，批评《天狼星》“语言太明朗，意象太清晰”，“强调主题，企图刻画完整人物”，不符合超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余光中则发表《再见！虚无》一文进行论辩。几年后，余光中对《天狼星》进行修改后重新出版，在重版的“后记”中，他说：“我自己认为当日《天狼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主题不够明确、人物不够突出，思路失之模糊，语言失之破碎。总而言之，是因为定力不足而勉强西化的原故。”再次对洛夫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1972年9月，执教于新加坡大学的关杰明教授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中国诗的困境》和《中国诗的幻境》两篇文章，批评现代派是“文学殖民主义的产品”，其作品是对西方诗构模仿、抄袭和学舌。而《文季》、《中外文学》和《龙族评论专号》等杂志也分别发表了台大教授唐文标的四篇文章：《僵毙的现代诗》、《诗的没落——台湾新诗的历史批判》、《日之夕矣——平原极目序》、《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这四篇文章被认为是射向现代派的四颗“核弹”，是对现代派进行的前所未有的批判。于是，又招致现代派的第二次群起反攻。论战之激烈，发展到了人身攻击。有意义的是，通过这次论战，逼得现代派诗人们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正如现代派名将余光中说的：“唐文标的几篇文章冲击和影响力相当大，逼得诗人们不得不做一些反省，而逐渐地摆脱病态的现代主义的束缚，另辟蹊径，重返传统——不是形式，而是一种自觉的认知。于是讨论文学里的时代社会意识的文章便多起来了，不染人间烟火的作品开始受到严厉批判。诗人们也喊出：唯有真正

属于民族的，才能真正成为国际的了。”^[5]

1972年，又出现一名批判现代派的猛将——台湾诗人高准。他在台湾《大学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现代诗的歧途与应行方向》。在文章中，高准给现代派开列了八条罪状，并提出自己关于诗的八点主张。此文后经修改，又发表在高准自己主编的《诗潮》诗刊1978年第3期上。高准的批判，已是台湾现代诗论战的尾声。7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现代主义运动走向低潮，许多诗人已截断那“走向西方”的印痕，改变诗风诗观，回归传统。三大诗社或分崩离析，或名存实亡。因此，高准的批判文章未能再次掀起论战的波澜了。

综观持续20多年的现代诗论战，恰是台湾现代派惨淡经营的兴衰演变的全部过程。其兴是好事，其衰未必是坏事。通过论战，人们加深了对现代派的认识，分辨了谬误与合理，消除了盲目与偏见，形成了客观与和谐的共识，促进了台湾新诗的理论建设和趋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最大的收获还在于，台湾现代派这匹脱缰的“现代”之马（尤其是现代派诗），在西天狂奔了近20年之后，终于笼头顾盼、斯文转向、回归东方，走上新文学发展的康庄大道。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给台湾文坛带来的主要变化，是其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已不再是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故事和大兵形象，他们注重的是对人和人性，以及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复杂性的描写。艺术上，他们不要民族文学传统的“纵的继承”，而是要“横的移植”西方的现代主义，以反理性、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作为思想支柱，提倡“纯艺术”、“纯文学”^①。因此，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与中国传统文学有着明显差异的艺术特征。

描写“现代人”及其精神世界，是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最为注重的一个根本内容。我们前面说过，50、60年代的台湾社会已全面

倒向西方。东西方文化激烈的碰撞与冲突，导致台湾现代人们的心态危机。“由于缺乏有意义的主义的服膺”，失去信仰而感到空虚；由于物质文明畸形发展带来的背谬混乱，失去道德而彷徨不安；由于孤悬海外、前途渺茫，酿成漂泊无根的痛苦与失落；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被怀疑和反叛，造成幻想的破灭和精神的颓唐。于是，这些现代人的悲剧便成为台湾现代派作家热衷表现的主要对象。陈映真的前期小说受现代派影响较为明显，其《死者》、《那么衰老的眼泪》等作品，主要描写的是主人公的孤独、感伤、苦闷和厌世，人物大多在失败中走向自杀，形成一种契诃夫式的“苍白惨绿”的色调。王文兴的长篇小说《家变》，以主人公范晔对父母感情变化为线索：对父母的依恋、崇拜转变为恐惧、仇恨，最后虐待父亲使之离家出走，描写了主人公一方面百般虐待老人，一方面又在舆论的压力下去寻找父亲，表现了“现代人”范晔企图突破传统道德观念，从根本上取消家庭关系的苦闷。小说真实地解剖了台湾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阶段、西方意识向东方意识入侵过程中、金钱和道德发生剧烈对撞情况下，人情淡漠和家庭关系破裂的现状。在台湾现代派作家笔下，有所谓“彷徨的一代”（指生活在台湾的青年一代），和“无根的一代”（指羁旅异国的台湾留学生），他们都具有“现代人”的特征。前者在病态社会中，消沉悲观，表现出心理变态和颓废厌世之情；后者漂泊无根，悠悠乡愁，孤绝难忍，心头一片空虚。他们都是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角。可见，描写“现代人”及其精神世界，是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

走向“自我”，偏重于心理表现，探索个人的内心世界，挖掘人的潜意识，是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追寻的主要目标。台湾现代派作家受西方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十分崇拜19世纪以来西欧、美国的诗